

Selected Cultural Relics from

Haidian District

Edited by Haidian Museum

Cultural Relics Press

海淀文物 精选集

海淀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Selected Cultural Relics from

Haidian District

Edited by Haidian Museum

Cultural Relics Press

海淀文物 精选集

海淀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贾东营

责任印制：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淀文物精选集 / 海淀博物馆编. -- 北京：文物

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010-4023-0

I . ①海… II . ①海… III . ①出土文物—海淀区—图

录 IV . ① K8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8807 号

《海淀文物精选集》编委会

主 编：李 昂

副 主 编：李 志

执行主编：李 伟

编 委：马明杉 鲍晓文 王承浩 姜英璠

摄 影：谷中秀 罗 征 刘小放 李 志

设 计：肖 晓

策 划：北京博物天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BWTC)

海淀文物精选集

海淀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16

印 张：19.5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4023-0

定 价：380.00 元

本书图版与文字为独家所有，非经授权同意不得复制翻印



- 004 红叶黄花自一川 ——海淀古代文物概说
Red Leaves and Chrysanthemum Flowers were Cultivated at the Same Fertile Plains:
Uniqueness of Cultural Diversity Discovered in Haidian District
秦大树 / Qin Dashu
- 037 第一部分 / Part 1
陶器 / Pottery
- 065 第二部分 / Part 2
瓷器 / Porcelain
- 143 第三部分 / Part 3
玉器 / Jade Wares
- 199 第四部分 / Part 4
金银器 / Gold & Silver Wares
- 253 第五部分 / Part 5
造像 / Religious Statues
- 277 第六部分 / Part 6
其他 / Others
- 298 海淀区域内的两汉时期考古发现
Han Dynasty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Haidian District
岳升阳 / Yue Shengyang
- 302 海淀区域内的明清时期墓葬考古工作概况
A Survey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Tombs Located in the
Haidian Area
李伟 / Li Wei
- 310 后记 / Epilogue

Selected Cultural Relics from

Haidian Distri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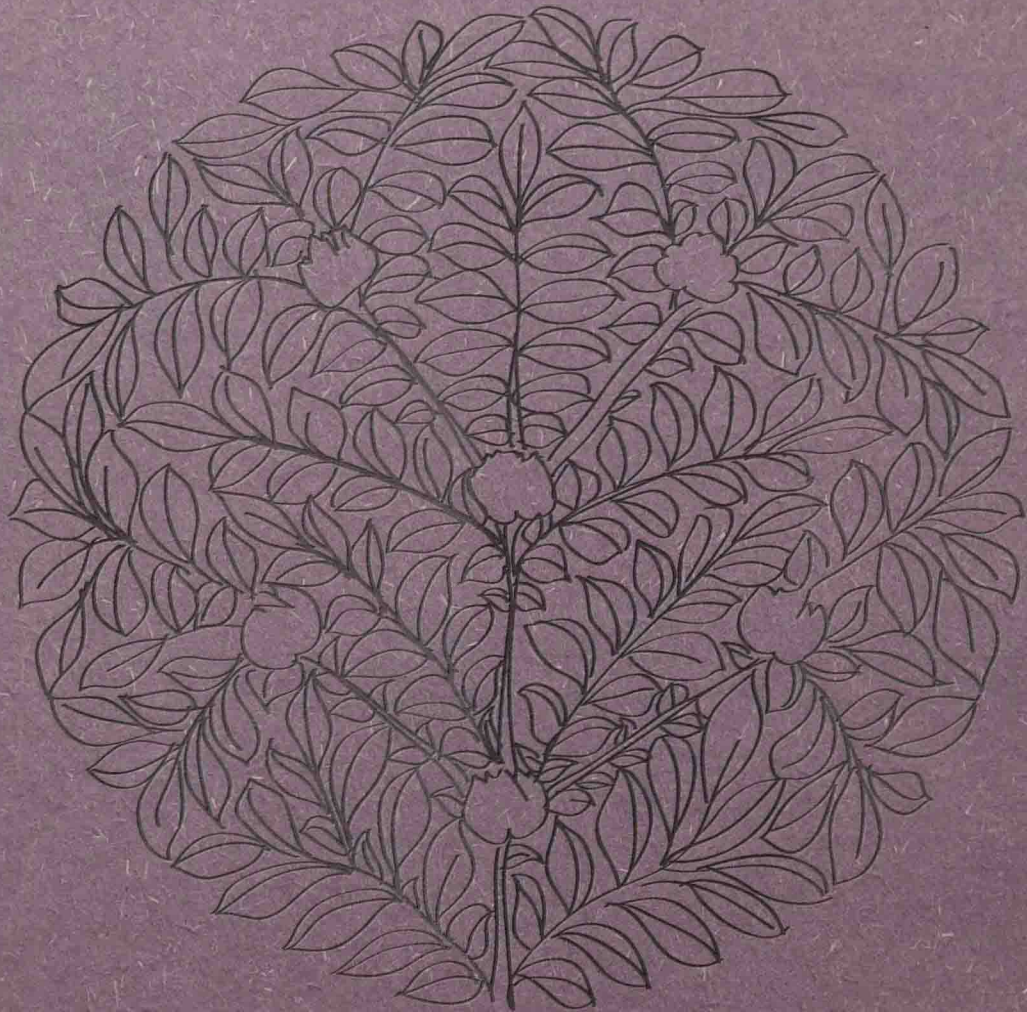
Edited by Haidian Museum

Cultural Relics Press

海淀文物 精选集

海淀博物馆 编

文物出版社





- 004 红叶黄花自一川 —— 海淀古代文物概说
Red Leaves and Chrysanthemum Flowers were Cultivated at the Same Fertile Plains:
Uniqueness of Cultural Diversity Discovered in Haidian District
秦大树 / Qin Dashu
- 037 第一部分 / Part 1
陶器 / Pottery
- 065 第二部分 / Part 2
瓷器 / Porcelain
- 143 第三部分 / Part 3
玉器 / Jade Wares
- 199 第四部分 / Part 4
金银器 / Gold & Silver Wares
- 253 第五部分 / Part 5
造像 / Religious Statues
- 277 第六部分 / Part 6
其他 / Others
- 298 海淀区域内的两汉时期考古发现
Han Dynasty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Haidian District
岳升阳 / Yue Shengyang
- 302 海淀区域内的明清时期墓葬考古工作概况
A Survey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of the Ming and Qing Tombs Located in the
Haidian Area
李伟 / Li Wei
- 310 后记 / Epilogue

红叶黄花自一川¹

——海淀古代文物概说

秦大树

一、海淀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沿革

海淀区位于北京市区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边缘与太行山余脉——西山山脉交汇地带，兼有山地平原，地形西高东低。西部山峦起伏，有大小山峰60多座。东部的海淀区平原属华北平原北部边缘，位于西山东部，向东微倾斜，可分两部分：百望山以南称山前平原区，以北称山后平原区。山前平原为永定河洪积扇，山后平原为南沙河、南口冲积扇，平原海拔为35-50米。

海淀区历史上河、湖、泉众多，水流交错，不仅是北京早期农业发展重要的灌溉之源，也是后来金、元、明、清乃至如今都城供水的重要地表水源地。主要河流有南长河、清河、万泉河、小月河、南沙河、北沙河等²。

可以说，海淀区是倚山拥水，群山雄峙，众水交流，古往今来，就是人类的宜居之地，有着丰富的古代遗存；又景色雄奇，寺庙园林星罗棋布，历史上兴修了众多的水利工程，成为古代农业生产高度发达之地。历史时期以来，这里人文荟萃，被视为风水宝地，使海淀区成为依附重要城市和都城的文物汇聚之地。

历史上海淀区现辖地区没有设置过单独的行政建制，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区境南半部自秦汉以来主要是隶属于历代北京城的附郭县，金、元两代还曾有少部分地区分别是金中都、元大都的城区，明清时期，绝大部分划入京师直辖区。而北半部历来都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大行政区属县（州）的辖区³。

至迟在商代后期，今北京地区已有燕、蓟等方国，是商的属国。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燕、蓟两个诸侯国于今北京地区。燕国

于北部“置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⁴，今海淀区辖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属于燕国上谷郡管辖。秦统一后，在原燕国北部保留上谷、渔阳等五郡，又设广阳郡，其中海淀部分地区可能属广阳郡（或上谷郡）蓟县、上谷郡军都县所辖。西汉一朝，海淀地区可能属于广阳国蓟县、上谷郡军都县。到东汉末年，则分属蓟、军都和昌平县（均为广阳郡辖县）。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绝大部分时间内今海淀区辖区南部始终为燕郡蓟县辖地。其北部在三国至北魏前期分属于燕郡军都、昌平两县，至北魏末年则属军都县，东魏至北齐可能分属于军都县及昌平、万年（又称“万言”）、广武、沃野等4个侨置县⁵。

隋大业三年（607年）废幽州，置涿郡，今北京地区大部分属涿郡所辖。唐建国后复置幽州，今海淀区辖域在唐天宝元年（742年）前后可能分属幽州（范阳郡）的蓟、广平、广宁、昌平县和带州孤竹县（寄治），其后一直到五代后唐，可能分属于蓟、幽都、玉河、燕平等县。值得一提的是，705年后，羁縻州带州及其属县孤竹县寄治于昌平县境，“孤竹，旧治营州界。州陷契丹后，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为州治”⁶，即今海淀区太舟坞村，这是海淀地区范围内历史上最早见于史料的县级治所。可见，海淀区自先秦迄隋唐，一直是方国或地方重镇的附郭之地。

自契丹天显十一年（936年）起，今北京地区先后由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达400多年。辽在此置南京，金中都则为实际使用的正式都城，后又成为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的首都。契丹会同元年（938年），“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设南京道。开泰元年（1012年）十一月“改

1 “红叶黄花自一川”句出自（金）周昂诗：《香山》：“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野水趁人如有约，长松阅世不知年。千篇未暇偿诗债，一饭聊从结净缘。欲问安安心已了，手书谁识是生前。”这里用此句意在表达海淀文物的多样和独特。载（金）元好问：《中州集》卷四，第167页，中华书局，1959年。

2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志》第二编，第一章，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志》第一编，第一章，北京出版社，2004年。

4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2886页，中华书局，1959年。

5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二上第五》，第2493-2494页，中华书局，1974年。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第1524页，中华书局，1975年。

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⁷，海淀地区分属于辽南京道析津府的析津、宛平、玉河、昌平等县。尽管辽南京还是一个陪都，但作为中原和北方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或山林部族的交界之处，其扮演的连接与交汇的角色日益彰显，作为民族涵化、文明冲突和交融最激烈的区域，在古代历史和文物制度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金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弑兄即位的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贞元元年（1153年）改为“中都”⁸。金贞元二年，析津县改称大兴县，大兴、宛平两县分治中都城。金中都由辽南京扩建而成，西北方向将今海淀区羊坊店路以东、黄亭子至会城门一线以南地区括入，其他区域的归属大体仍辽之旧。至金代末年，分属于中都路大兴府的大兴、宛平、昌平等县。据已发现的辽代石刻记载，今魏公村、西二里沟、公主坟一带属宛平县，今北安河、大觉寺一带属玉河县⁹。

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中都，“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¹⁰，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在金中都旧城东北兴建新都¹¹，至元八年（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大元”，次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¹²，今海淀区东部偏南一部分地区划入新都城垣内（即今元代土城以内地区）。至元十一年（1274年）重置大兴、宛平两县衙署。至元二十四年，筑城工程全部告成，有元一代，海淀地区南半部大体属宛平县，北半部大体属昌平县。一些重要的寺庙也分布于海淀地区，是元大都最重要的附属地区。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攻占大都城，随即将大都路改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建北京于顺天府，称为行在”¹³，辖今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称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于此。明代海淀地区仍分属宛平、昌平两县（州）。明初，据《永乐大典》辑本《顺天府志》记载，海淀地区内宛平、昌平两县分界，与元代大体相同。清朝沿明旧制，于京师仍置顺天府。清代顺天府所领州县多有变化，大兴、宛平始终为京县，直辖于府，昌平等州县在康熙十五年

（1676年），“始以昌平等十九州县来隶”¹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顺天府辖区内设东、西、南、北四路厅，大兴、宛平等县属西路厅，昌平州等地属北路厅。清代，今海淀区南半部和温泉、冷泉、北安河一带隶属于宛平县，北半部大部隶属于昌平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以后，随着玉泉山静明园和此后圆明园的兴建，宛、昌分界才发生较大变动。

可见，自金代以后，海淀随着北京整体地位的变化，从一个地方重镇和陪都的属县辖区，变为都城的一部分和周边地域，特别是清代，在海淀建设了圆明园及附属的苑囿以后，这里实际扮演了一个陪都或夏都的角色。这些构成了海淀文物在帝国时期前、后阶段出土文物的不同特色。

二、文明的曙光——史前时期海淀的文化遗存

1. 古生物化石发现地点

北京这片山前平原地区，河流纵横，是生物和人类的宜居地区，在海淀区的土地上，多年来发现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古生物化石。1956年，于海淀区黑山扈安河桥挖井过程中，在山前清河上游冲积层地下10米砾石层发现象臼齿，周明镇检测属于更新世晚期¹⁵。1956年秋，海淀区羊坊店北柳林馆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在永定河洪积扇地下6.5米砂砾石中发现有原始牛头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胡长康对其进行检测，确认其属于更新世晚期¹⁶。1957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李凤林在海淀区白家疃做调查时，在山前丘陵石灰岩裂隙中发现獾化石，证明其属于更新世晚期¹⁷。1976年7月，海淀区羊坊店北蜂窝修筑人防工程时，在永定河洪积扇地下6.8米的砂砾石中发现有原始牛头骨，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阎德发采集了标本，并进行检测，确认其属于更新世晚期¹⁸。1999年，海淀区四季青乡玉泉砂石厂在采石过程中，在永定河沉积带发现了古菱齿象牙，属更新世晚期¹⁹。2005年，在海淀区上地地下

7 (元)脱脱等：《辽史》卷十五《圣宗本纪六》，第171页，中华书局，1974年。

8 (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四《地理上》，第572页，中华书局，1975年。

9 北京市海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海淀区志》，第50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10 (明)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地理一》，第1347页，中华书局，1976年。

11 (清)于敏中引《元史·地理志》：“(至元)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新城而迁都焉。”(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四，第6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 (明)宋濂等：《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第140页，中华书局，1976年。

13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地理一》，第883页，中华书局，1974年。

14 《清史稿》卷一百十六《职官三》，第3335页，中华书局，1976年。

15 周明镇：《北京西郊的Palaeoloxodon化石及中国Namadicus类象化石的初步讨论》《古生物学报》1957年第2期，第283-294页。

16 胡长康《北京西郊一原始牛(Bos primigenius)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期，41-42页。

17 郭京宁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史前卷》，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8 郭京宁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史前卷》，第1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9 焦晋林：《丹棱撇贝——京西出土文物品鉴》，第224页，学苑出版社，2010年。

9米深沙层中发现了古菱齿象牙,证明属于晚更新世晚期²⁰。2007年,在海淀区知春里,也发现古菱齿象牙化石²¹。海淀博物馆收藏有出土于玉泉山南部地区的菱齿象牙化石和原始牛角化石²²。菱齿象是生存于晚更新世时期(距今约10万-1万年)的大型哺乳动物,海淀区众多的菱齿象化石的出土,表明在远古时期,今天的海淀大地上水草丰美,林木茂密。

距今六七十万年前,人类的远古祖先——北京猿人即在北京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北京猿人的行迹一定也到达过海淀的地面,充分表明这里在远古时期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动物和人类的家园。

2 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文明已遍及海淀。从海淀镇向东北延伸的清河台地,被称为海淀台地,是人类文明密集分布的地带。海淀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北京大学校园内的石斧,就是海淀台地出土的新时期时代晚期的遗物。1982年,在位于苏家坨镇苏二村苏家坨砖厂东侧,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在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中出土了红陶片²³。1956年,北京大学佟府甲三号院发现有做工精致的石斧²⁴,同年,校园内十楼前发现细石器,采集有石器100多件,废片等200多块²⁵。1997年北大理科楼群建筑工地发现一批陶器、石器、兽骨及植物标本。陶器以孱云母的红陶为主,次为夹砂陶、泥质陶,器形以罐为主。基本为手制,素面,部分磨光,据碳十四测年,此处被称为燕园遗址的时代为 4400 ± 100 年²⁶。此处属于斜穿海淀台地的古水沟,时代约与北京的史前文化雪山一期略同²⁷。此外,海淀区还有中关村、清河、白家疃、田村等处发现过细石器和磨制石器²⁸,可见海淀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属

于雪山文化的范畴。

三、燕蓟霞光——夏商周时期海淀的文化遗存

进入原史时期以后,北京地区在夏商两代均属边地,位于文明与蛮荒的交界地域。至西周时,分封了燕、蓟两个方国于今北京地区,燕并蓟后,都蓟城,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今海淀一带地处古蓟城的西北郊,是北方草原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有成熟的制陶业和多种金属货币的铸造业。海淀区朱房村古城城墙夯土中发现的典型战国陶片,表明在战国时期这里已开始建城,可能属于蓟城的外围城镇。

海淀区目前发现的此期的古代遗迹主要是战国时期的墓葬和一些钱币窖藏,其分布的区域大体与新石器时代相同而略有扩展,主要分布在海淀台地和周边地区。1949年在八里庄街道玲珑路发现瓮棺墓2座,南北向,均由相对接的陶瓮组成,瓮内有不足3岁的幼儿遗体一具,头北足南²⁹。1955年在海淀区中关村中关园内修建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几座战国时期的瓮棺墓,墓呈正南北向,长0.5米,宽0.3米。瓮棺由两件“鱼骨盆”类陶瓮相对接而成,瓮棺北端用几片素面泥质灰陶片覆盖其上,棺内尸体腐朽,无任何随葬品³⁰。1991-2001年,为配合上地开发区的建设,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海淀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发现较大规模的墓群,其中有8座为战国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些陶器、铜镜、铜印和带钩等金属器³¹。2007年,在海淀区青龙桥新村房地产开发工地发现战国瓮棺墓5座,每件瓮棺均由两件直腹深底、口沿外侈的陶釜相对接而成,大型陶釜长50厘米,小型釜长30厘米左右,瓮棺内均盛敛小孩骸骨³²。

海淀区还多次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钱币窖藏。1982年,在苏家坨镇苏二村苏家坨砖厂东侧的遗址发现战国刀币,该遗址的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³³。1953年6月,在海淀区紫竹桥

20 董育纲:《北京山地出土古菱齿象牙与现场收取保护》,《北京文博》2006年2期,第93-95页。

21 焦晋林:《丹稜撷贝——京西出土文物品鉴》,第224页,学苑出版社,2010年。

22 李昂主编:《沉香越千年——海淀历史文物展》,2-3页,海淀博物馆,2012年。

2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9页。

24 岳升阳:《北大燕园的文化埋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5卷31期,第55-61页。

25 魏效祖:《北京海淀区发现细石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第73页。

26 岳升阳等:《燕园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第9-12页。

27 郭京宁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史前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28 关成和译:《北京北部清河镇发现新石器时代磨光石斧》,《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2期,第109页,原文发表在自苏联《图书馆员》1953年7期。魏效祖:《北京海淀区发现细石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7期。

29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

30 王克林:《北京西郊中关园内发现瓮棺葬》,《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1期,第121页。

3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宋大川:《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第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3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62-6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3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发现方折式“匱”字刀币，总量约4公斤³⁴。1976年，在海淀区温泉公社东埠头村地下2米深处发现方折式“匱”字刀币，共数百枚³⁵。1978年，在海淀区梁家园西山农场果树三队，生产中发现了方折式“匱”字刀币约2公斤³⁶。1989年海淀区谷香园食品厂也出土了明刀窖藏，出土的刀币现藏海淀博物馆³⁷。

此外，海淀区还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其他遗物。1957年5月，在海淀区东北旺村北农场，发现战国时期铜簠一件，器底有铭文³⁸。零星发现的战国陶器就更多了，主要是灰陶质的陶罐和壶等。1971年8月，海淀区八里庄出土战国陶壶一件³⁹。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管线施工中，也曾出土过战国灰陶罐。

可以看到，战国以来，海淀区出土的文物迅速增加，表明燕、蓟对北京地区开发的效果。特别是密集的铜币窖藏的发现，表明海淀地区在战国时已成为一个得到高度开发，农业、商业、手工业都迅速发展的地区。

四、边陲巨邑——汉唐时期海淀的文化遗存

1. 两汉时期，海淀地区可能属于广阳国蓟县、上谷郡军都县，社会经济较前更加繁荣，表明这时期农耕文明已延伸到了这里，北京一带成为北部边陲的重镇和经济中心。海淀区范围内的两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以小型的墓葬为主，此外还有少量城址和建筑遗迹。

1951年，在海淀区清河镇至朱房村的区域内，曾先后发现许多西汉和东汉土坑墓，出土有灰陶绳纹大瓮、壶、鼎等陶器，还有砖瓦、半两钱、五铢钱等⁴⁰。1962年冬，在海淀区永定路清理了一座汉代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小型土坑墓，骨架保存完好，出土陶器、西汉五铢钱及铜镜一面⁴¹。1982年，在位于苏家坨镇苏二村苏家坨砖厂东侧的一处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

遗址，清理了汉代墓葬6座，墓葬多为单室砖墓，大部分遭破坏。出土器物有铜镜、铜车马饰、灰陶壶、罐、盆及汉代陶片⁴²。1982年，在海淀区万寿路五棵松附近的炮兵司令部大院内发现3座汉代墓葬，出土有陶器和丝织品⁴³。2004-2005年，海淀区复兴路五棵松篮球馆工程占地范围内发掘了7座汉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式墓葬，其中M3及M5为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有红陶壶、红陶钵、灰陶壶、灰陶罐。其他主要随葬灰陶罐，为东汉时期墓葬⁴⁴。棒球馆内发掘1座汉代砖室墓，为前单室，后双室墓，出土铜钱及一面铜镜，发掘者将年代定在东汉中期⁴⁵。1984年，在海淀区海淀街道万泉庄南发现2座西汉陶井，3座西汉土坑墓，墓葬出土陶壶、仓等陶器，还发现有汉代五铢钱⁴⁶。1985年，在西玉河一带发现多座砖室汉墓，破坏严重，形制模糊，其中一座单室墓出土陶罐等陶器和数件银器⁴⁷。海淀区最大规模的汉墓群发现于海淀区上地街道上地信息产业基地，1991-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00多座汉代墓葬⁴⁸。此外，近年配合上地佳园的兴建，在原上地村的菜地、果园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探工作，发现一批墓葬，该墓葬区属战国、秦汉时期，应该是一条高于地面约3米的台地。其中98座墓葬属于汉代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多边形，极少量耳室墓，均为竖穴，部分青砖铺设墓地，也有砌筑墓圻、券拱的⁴⁹。2007年，在海淀区青龙桥新村开发区内发现墓葬遗存，属于汉代墓葬的有M2及M4，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陶罐、钵、鼎、仓等⁵⁰。

34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70页。

3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6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36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6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37 李昂主编：《沉香越千年——海淀历史文物展》，6-7页，海淀博物馆，2012年。

38 北京市文物组：《海淀区发现春秋时代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第72页。

3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5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40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70页。

41 喻震：《北京永定路东汉墓》，《考古》1963年3期，第170-171页。

4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五棵松篮球馆工程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第1-7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45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五棵松棒球场工程考古发掘报告》，《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第381-382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46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7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8 李达：《海淀上地村东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第146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其中公布发现的5座东汉墓。宋大川：《近年来北京考古新成果》，《北京文物与考古》第5辑，第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2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49 郭立展执笔，宋大川主编：《实创房地产开发公司上地佳园考古勘探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海淀卷，第348-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50 郭立展执笔，宋大川主编：《青龙桥新村考古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海淀卷，第348-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位于海淀区清河街道朱房村的是一座汉代古城遗址，1955年对其进行了局部发掘。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发现陶井十几处，出土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及板瓦、瓦当、筒瓦等，另发现一批铁器，包括铁剑、铁刀、铁锄、铁镜等，还发现了铜印⁵¹。海淀区还发现了大批的汉井遗迹，主要分布在今颐和园到玉泉山一带，都用巨大的灰陶井圈建造，尽管这些遗迹的资料并未得到报告，但可以看到，这时期在海淀区的西部地区农业已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此外，在清河镇朱房村发现了汉代窑址，清理了汉代的窑基⁵²。这些发现都很好地诠释了两汉时期海淀一带生产发达，人口滋殖的繁庶景象。

2.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制度。位于北京市的蓟城为幽州治所，也始终为燕郡（燕国）治所，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是北方边陲的巨邑。

此期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是海淀区玉潭乡八里庄魏墓。此墓1987年发掘，位于八里庄东北，墓为双室砖室墓，南北向，由墓道、墓门、前室、甬道、后室组成，出土了成套的黄釉俑和模型明器，包括两件生动的舞俑、仓、灶、井、磨、臼、猪圈等模型明器，用作酒具的樽和勺、奩、榻、扁壶和虎子等用具。自汉代以来，北方地区就流行成套的釉陶明器，但在今黄河沿线的地区流行绿釉明器，河北省邯郸以北的地区则流行一整套的黄釉明器，这座魏墓出土的黄釉明器，为接近北方边地的区域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黄釉陶明器组合。此外，八里庄魏墓还发现了五铢钱，特别是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铜质弩机，上有规整的阴刻铭文：“正始五年三月卅日左尚方造步弩耳监作吏王昭匠马广师张雄”⁵³，证明这座墓的时代为曹魏正始五年（244年）以后不久。与八里庄魏墓颇为相似的还有草场西晋墓，1962年发现于苏家坨镇草场村，共2座。两墓均为砖室墓，斜坡墓道，拱券顶，也出土了成组的黄釉陶明器，如车夫俑、牛车、牛、鸡、灶等，另有铜钱、铜镜、铜铃⁵⁴。

海淀区还清理出另外的一些南北朝时期的墓葬。1953年在清河镇发掘了一座魏晋大型砖室墓，该墓葬为悬棺下葬，出土

了铜镜、铜刀、陶盃、五铢钱等。离该墓不远还发现了砖坑，出土铁犁铧2件⁵⁵。1953年，在海淀镇八一小学发现有魏晋北朝土坑墓1座。1962年，在海淀区景王坟西北还发现2座西晋砖室墓⁵⁶。

两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古代水利工程的考察。在今紫竹桥西南至石景山的永定河畔有一条古渠，据岳升阳研究，这就是始建于曹魏的车厢渠。根据零星的考古发现相连后可以得到古渠的走向，南端相当于在紫竹院旁边的高梁河畔，北端在成府村至清华大学一带汇入万泉河。其南段与白石桥路大致重叠，北段与海淀路大致平行，但在当代商城以北似乎又分支⁵⁷。车厢渠走向的明了，对于了解两晋时期渠流经地区的农业和民居都有重要作用。

3. 隋唐时期，是北京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的时期。幽州是唐代的大州，占地超过16坊，是北方重镇。“安史之乱”中，史思明以幽州城为“燕京”（759年），这是历史上首次称北京为“燕京”。晚唐藩镇割据时又是三大藩镇之一的幽州节度使（兼卢龙节度使）辖地，为后来北京成为帝国的都城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北京发现过一些重要的唐墓，海淀是较大型唐墓的集中发现区域。1980年在海淀区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外发现了一座唐代早中期的砖室墓，墓南北向，门朝南，券顶，出土有白彩陶片，大致包括罐、碗、盆等，另有墓志一方⁵⁸。1973年，在清河镇朱房村发现一座唐代天宝年间的墓葬，墓葬为长方形砖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随葬器物仅剩黑陶碗、彩陶四系盖罐、陶盘和墓志一合。据墓志可知，该墓主人王徽，是开元观道士⁵⁹。

1985年，在海淀区翠微路14号院内发现唐墓一座。该墓为圆形穹隆顶单室砖墓，墓内绘有壁画，还有砖雕的门窗、灯檠和仿木构建筑等，皆涂油朱彩。棺床在墓室北部，其中出土墓志一件。据墓志可知，该墓为唐大中元年（847年）游击将军纪制夫妇墓⁶⁰。这座墓是晚唐时期北方地区最早的仿木构砖室

55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71页。

56 董坤玉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7 岳升阳：《双榆树古渠遗址与车厢渠》，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第4辑，第126-127页，1994年。

58 洪欣：《北京近年来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16页。

5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年第6期，总498-500页。

60 洪欣：《北京近年来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20页。

51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编：《北京地区汉代城址调查与研究》，第124-12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胡传莹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汉代卷》第38-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2 周耿：《介绍北京市的出土文物展览》，《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8期，第71页。

53 董坤玉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3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墓之一。

1992年,海淀区文管所在八里庄某单位施工现场清理一座唐墓。墓为弧方形单室砖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门朝南,墓道为斜坡式,墓内有砖砌棂窗、壁龛,墓内顶部及四壁均有壁画装饰。重要的是在墓室后壁较完好的保存了一幅长2.9米,高1.56米的通景画式的屏风画,内容是牡丹芦雁图,为晚唐五代时期北方地区墓葬的装饰特点和唐代绘画史研究,特别是花鸟画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因墓内早年被盗,仅有少量器物碎片和墓志一合,根据墓志记载,此墓为唐大中六年(852年)幽州节度判官王公淑墓⁶¹。

1984年,在海淀区二里沟发现唐墓1座。墓葬为圆形单室砖墓,南北向,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墓门开在南边,北部为棺床,北壁上抹白灰并绘朱红色花纹。随葬品仅见陶器碎片和墓志一合,从墓志可知为唐广明元年(880年)兵马使充使宅将副将茹洪庆墓⁶²。1966年在修建京密引水工程中发现一座唐墓,墓早年已毁,仅存墓志一合,根据墓志可知为唐乾元二年(759年)青山州(鞞縻州)刺史李永定墓⁶³。此外,发现的较重要的纪年唐墓还有海淀区万寿路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温令绶墓⁶⁴,海淀区二里沟进出口大楼院内发现的唐广明元年(880年)墓⁶⁵,海淀区温泉白家疃文德元年(888年)要氏夫人墓等⁶⁶。

此外,在偏北部的地区,即距离幽州城更远一些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些唐代的不带壁画装饰的简单砖室墓和小型土坑墓。1988年,在清华大学院内偏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批小型竖穴土坑墓,海淀区文管所进行了清理,墓葬的等级并不高,但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遗物,如唐代邢窑的碗,巩义窑的高足杯和精美的花鸟纹菱花镜等,这些遗物现存海淀博物馆⁶⁷。1991-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海淀上地街道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发掘的墓群,其中有2座为唐代墓葬⁶⁸。2003年,在物

资储备学校发现唐墓1座。墓葬为长方形斜坡式砖室墓,方向185°,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墓道在墓室南侧。出土人骨2具,头朝南,随葬品包括陶缸2个,棺环3个⁶⁹。2006年,在北京市香山植物园卧佛寺公交车站改造工地中发现唐墓一座。该墓葬为半椭圆形砖室墓,券顶,出土了陶罐、陶器座及盖、还有开元通宝2枚⁷⁰。

五、交融与涵化——宋辽金元时期海淀的文化遗存

辽金元时期(包括宋代短暂的占领时间),长城南北一线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演变,契丹、女真、蒙古等骑马民族交替南下。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周边冀晋北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隅地区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之下,表现出人群族属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交融性,而这种擅代文化之变和族属涵化现象使北京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出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也恰恰是在这时,作为沟通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重镇的燕京,以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成为了中国巨大帝国的都邑。展现了都城文化的特有面貌。

1. 辽统治时期。公元936年,辽统治者获得燕云十六州后,升幽州为辽五京之一,称南京。开泰元年改称析津府。北京地区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变成了边境王朝的南界,成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交流、交融的中心地区。经过考古勘察,结合文献记载,证明辽南京的西北角约在今海淀区东南角位置,有小部分区域重合。

在海淀区发现有一些辽代墓葬,并出土有不少精美文物。1953年,在西翠路修下水道过程中发现辽墓,北京市文物局随即对该墓进行了清理。此墓为仿木构圆形单室砖墓,墓内保存有较丰富的壁画,题材包括假门、花卉、水鸟等,漫漶严重,未见棺槨。出土有开元通宝、乾元通宝等钱币,及大小玉带扣、薄银片,精美的定窑白釉素面葵花口大碗、武士陶俑等⁷¹。

1985年,在海淀区苏家坨镇聂各庄西北发现四座圆形单室砖室墓,海淀区文管所进行了清理。4座墓葬均被盗,多有壁画的痕迹,但破坏严重,其中一座墓还保存有一幅较完整的壁画,为备茶图中的风炉和汤瓶部分。4座墓的葬式都采用了火葬,

61 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年第11期,45-53页。

62 洪欣:《北京近年来发现的几座唐墓》,《文物》1990年第12期,第17页。

6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3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64 董坤玉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5 董坤玉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6 董坤玉著,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7 北京市海淀区博物馆编:《海淀博物馆》,12-15,154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68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62-6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69 郭立展执笔,宋大川主编:《物资储备学校住宅区考古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海淀卷,第1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70 郭立展执笔,宋大川主编:《香山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公交车站改造工地考古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工作报告(2000-2009)》海淀卷,第280-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71 苏天钧:《北京郊区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第89-93页。

墓中出土了一些残陶器和宋辽铜钱⁷²。

199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抢救性发掘了海淀区羊坊店邮电局宿舍以北基建施工中发现的1座长方形券顶单室砖室墓。该墓保存较好,南北向,墓顶上铺有平砖一层,墓北端0.4米处有祭台一个。头顶部随葬有鸡冠壶、小黑陶罐、灰陶罐、骨质粉盒、贝壳、刷子柄、骨簪、铁剪刀等器物,此外还有一些漆器遗痕。在墓主胸部正中有铜镜一面,祭品台上有大型牲畜头骨一颗。这座墓形制较特别,出土物也十分丰富⁷³。

1991—2001年在土地信息产业基地建设工程中发掘的从战国到明清的墓葬群中,发现辽金时代墓葬30座,分为砖室墓和石椁墓两种,出土有铜镜、陶器、瓷器、玉器、铁器等⁷⁴。

2002年,海淀区增光路中国工运学院住宿楼北部施工发现1座辽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为仿木结构圆形单室砖墓,墓南向,由墓道、影风墙、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墓中出土了灰陶盆、灰陶碟、灰陶罐3件陶器,另有墓志一方。墓志记载墓主人逝于咸雍七年(1071年),墓志内容丰富了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家族墓的分围列葬情况⁷⁵。奥运前夕,在营建五棵松奥运场馆过程中,发现辽金墓3座,其中2座可确定为辽墓。两座辽墓皆为椭圆形砖室墓,出土器物多为陶器,包括陶盆、陶盘、陶盏等,亦出土有零星瓷器,如瓷碗、瓷盘之类,还发现有鸡腿瓶,质地较粗。

总体而言,海淀区发现的辽墓基本包括了北京所发现辽墓的各种类型,并有一些规格较高、出土物较丰富的辽墓发现。目前对于辽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区分期、形制研究、壁画研究、随葬品研究等多个方面。不过,与北京其他区县比,海淀区发现的辽墓并未显示出特殊的区域特征,因此在研究中,多将海淀区辽墓作为北京辽墓的一个部分进行阐释。

2. 金代的繁盛。1125年,金军伐宋获幽燕地区,改燕山府为南京。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南京,升为中都。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金中都的建立,开辟了北京作为首都的新纪元,此后,元明清一直沿袭至今。因此,金代是北京地区发展的重要时代。目前认为金中都的北垣与辽南京基本重合,与海淀区

有小区域重合。

海淀区发现的金代墓葬颇多。1956年,在甘家口街道二里沟发现张汝猷墓。此墓早年被毁,出土墓志一合,志文载,张汝猷歿于金泰和七年(1207年)⁷⁶。1978年在青龙桥街道娘娘府村发现蒲察胡沙墓。蒲察胡沙为金代贵族,娶世宗公主,姐姐为世宗妃子。其墓早年被盗,为土坑石椁墓,用六块石板砌建,棺底有一长方形石棺床,有火烧痕迹,出土有墓志一合⁷⁷。1979年,在甘家口街道半截塔村南发现金墓,为长方形单室砖墓,墓室东西长1.75米,南北宽1.15米,高0.6米。在墓室北壁近中部有小墓道,墓顶向上逐渐收缩,盖青石板,为火葬墓。出土有围棋子、绿松石饰品和铜钱等⁷⁸。

1985年,在四季青镇南辛庄西发现金墓,海淀区文管所进行了清理。M1、M2均为土坑石椁墓。M1早年遭日军盗掘,出土有定窑白瓷碗、瓜棱注子、盘、盒等,还出土有墓志一合,题墓主为宣武将军骑都尉张□震,考证其时代为金海陵王贞元至正隆年间(1153—1160年)。M2为夫妻合葬墓,此墓没有被盗,墓内有木棺痕迹。出土有定窑绿釉划花瓷枕、定窑白瓷盒、碗、盘、水注、罐、碟、粉盒、定窑黑釉托盏和陶砚,一个纸盒内放置的一整套化妆用具等遗物,体现了一套完整的金代前期墓葬随葬品的组合⁷⁹。此墓出土的一组早期定窑瓷器,表现出了制作工艺精粗的不同,但整体上体现出定窑精细白瓷的主要特征,包括黑定托盏,定窑受磁州窑影响生产的绿釉划花瓷枕,在报告发表时对于了解定窑金代前期的烧造情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1987年,在四季青镇金山山麓发现金代前期的土坑石椁墓,海淀区文管所进行了清理。此墓早年被盗,石椁为六块青石凿榫卯相接,椁长2.5米,宽1.41米,高1.2米,是一座金代前期的墓葬。清理出钧窑玉壶春瓶、盘、碗各一件,红黑两色缠枝花卉漆盒盖二件。另外,在盗洞口处发现有钧窑菱口钵及龙泉

76 侯璁:《金〈张汝猷墓志〉考释》,《北京文物与考古》第2辑,152-15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北京市文物局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上),第21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77 齐心:《金代蒲察墓志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01-105页,北京史研究会编印,1980年。另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6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78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卷》(下),第21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9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7期,56-66页。

72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考古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3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73 刘连成、李达:《海淀区羊坊店辽墓》,引自《中国考古学年鉴·1992》,第149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

74 王有泉:《一九九八年北京地区地下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成就》,《北京文博》,1999年第1期,第10-12页。

75 朱志刚:《海淀中国工运学院辽墓及其墓志》,《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六辑,第27-34页,民族出版社,2004年。

窑梅瓶残片⁸⁰。此墓的时代为金代前期，土坑石椁墓证明主要是女真贵族及家属使用，因此这座墓葬出土的几件钧窑瓷器，成为确定钧窑创烧时间的最重要的考古证据之一。

1998年，海淀区文管所在北京植物园内清理了一座金代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出土了一件磁州窑椭圆形白地黑花婴戏纹瓷枕和金“大定通宝”铜钱，证明此墓的年代为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始铸此钱之后⁸¹。此墓出土的瓷枕以往一向被认为是北宋的产品，此墓证明这类瓷枕的实际生产年代是金代后期。

此外，在北京大学院内⁸²、海淀区北安河等地也曾发现金墓⁸³，但并无详细报道。海淀区发现的金代墓葬大部分是在金代流行并十分有特点的土坑石椁墓，这类墓葬从金代开始在北京和周边的河北地区出现，主要是女真贵族和降金的契丹贵族使用，等级均比较高，往往出土一些高等级的文物。这类墓葬目前以北京地区发现的最多，集中分布在房山县金陵区域附近和海淀区，这似乎表明海淀区当时曾是女真贵族聚居的地区。

金代北京地区有一段十分特别的历史，即在宋金战争初期，金二帅完颜宗翰（粘翰）和完颜宗望（斡离不）分别驻扎在云州和燕，是攻击宋朝的前进基地。靖康之变以后，二帅挟宋二帝北上金源的五国头城，是从燕经行的，此外，二帅也曾继续驻扎两地，手下的一些官兵曾从北宋两京核心地区掠来大批北宋时期，特别是北宋后期的精美器物，部分就散落在了北京周边地区，这些文物对了解北宋后期的一些文物制度和手工业生产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前述四季青镇金山金墓出土的一组钧窑瓷器，可能就是北宋后期在河南地区生产的，宋金战争时被金兵掠来，回到驻地燕以后随葬在金初期墓葬中，这是钧窑始烧于北宋末期的重要证据。此外，1986年在四季青乡的河道挖沙时，出土了一枚“大晟”编钟，现藏海淀区博物馆⁸⁴。大晟编钟是北宋徽宗时恢复礼制，大批制作“新成礼器”的重要代表，靖康之变时大部分被掠往金源之地的上京，金代中期逐渐用于金王

朝的礼制性活动，目前保存下来的“大晟”编钟主要藏于北京、台北两故宫。这件编钟是唯一后期出土的个案，很有可能是当时掳掠此器的金兵所遗弃的。这是女真人从宋宫廷掠来的大批文物的少数出土的器物，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3. 蒙元时期。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攻占金中都，此后对金中都的经营是从蒙古人改变“得地不守”政策开始的，因此是金宋统治区内最早进入稳定发展的地区。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忽必烈曾修过一次燕京城墙，但旋即放弃了重修金中都的打算。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在金中都东北修建新都，到至元二十四年主城工程基本完成，前后筑城达二十年，使北京由一个地方性中心而成为了整个蒙元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于元大都的考古工作是最早引起学界关注的，民国时期营造学社就开展了一些工作。1964-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共同组成了元大都考古队，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这是宋元明时期考古最早的专门的城市考古队。因此北京元代考古最重要也最富有成果的工作，毫无疑问是元大都相关的考古工作。

元大都位于金中都东北方向。元大都遗址西北部分分布在今海淀区范围内（北土城的西半部），北城墙西门健德门，西城墙北门肃清门，均在海淀区。目前在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学院南路明光村向北至知春路口向东，保存有部分元大都北城墙西段和西城墙北端遗迹，全长4公里。元大都考古队曾在北都城墙清理了三处水涵洞遗址，其中花园路和学院路的两处都在海淀区范围内⁸⁵。残存最高处约8米，基宽22-24米，夯土版筑，夯窝明显⁸⁶。199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太平庄以北的元大都城墙进行了解剖发掘，证明城墙由四种土质分层夯筑，表明大都的城墙曾多次补筑⁸⁷。同时，海淀区文管所也曾配合整修乾隆时修建的燕京八景中“蓟门烟树”景点部分清理了大都西墙北段的部分城墙，出土了两门明末的大铜炮。

另外，在西土城路西侧有水涵洞遗址。位于北城西段墙下，肃清门北部的水涵洞，涵洞的金门底与两壁均用石板铺砌，顶部用砖起券，可见三券三袱，为都城之制。涵洞内外侧各用石块砌出6.5米长的摆手，整个涵洞的石底略向外倾斜。此处水涵

80 秦大树，王晓军：《记北京市海淀区出土的一组早期钧窑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2年第11期，80-92页。另见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卷（下）》，第214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81 高二岳：《海淀出土一件磁州窑瓷枕》，《北京文博》2000年1期，第76页。

82 苏天钧：《十年来北京市所发现的重要古代墓葬和遗址》，《考古》，1959年第3期，第160页。

83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167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84 北京市海淀区博物馆编：《海淀博物馆》，156-159页，文物出版社，2005年。

85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与发掘》，《考古》1972年1期，19-28页；徐萃芳：《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载徐萃芳：《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159-172页，台北：允晨文化，1995年。

86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考古地图集·北京分册（下）》，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87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考古地图集·北京分册（下）》，20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洞本经过元大都考古队的清理，后由于保护不利有所破坏，2002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这处水涵洞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进一步了解了其结构，并进行了保护。通过发掘可知，水涵洞的建造是筑夯土城墙之前预先构筑的，水关涵洞南北走向，长9.5米，高3.45米，底部和两侧都是用石板砌成，顶部为砖券，在涵洞中心部位装有一排断面呈菱形的铁栅棍，间距10-15厘米，底石和两壁皆以铁锭（细腰）加固。它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具有重要意义⁸⁸。

海淀区发现的元墓不多，199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颐和园内发掘了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这一时期较重要的墓葬⁸⁹。耶律铸为耶律楚材次子，官居中书左丞相，在元代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此墓为多室仿木构砖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前室东西侧室、后室及后室东西侧室组成。墓道位于前室南侧正中，距墓门不远墓道上方并列立有圆额墓志两块。墓室内壁均绘制有壁画，不过大多漫漶，仅可见云朵、花草、鸟兽等图案。此墓早年被盗，出土随葬品仍十分丰富，包括瓷器、陶器、银器、石器装饰品计180余件。其中瓷器有青白釉高足碗、双鱼盘、玉壶春瓶等。青白釉高足碗口径12.5厘米，足径4.5厘米，通高9.5厘米。侈口，尖唇，曲腹下收，圈足较高，足端外撇。腹部饰有云雷纹，并有“白”、“王”二字。陶俑共有48件，俑的质量都很差，多数为神煞类俑，有手执立牌的十二时俑、捧持各类生活用器的男女仆役俑等，及龙、凤、马、骆驼等动物。石器有汉白玉马、石狗等，一组8件玉石质明器有盘、碗、钵、盏托等。汉白玉天马长64厘米，宽30厘米，通高50厘米，座长55厘米，马身修长，四足较短，置于卷云纹中，下面有一长方形基座，雕刻精细。耶律铸墓独特的形制和丰富的随葬品，为元代前期葬制研究和文物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此外，1971年在大有庄村、1986年在永定路也分别发现了元代单室砖墓，出土有一些陶瓷器和铜钱⁹⁰。1985年海淀区文管所在航天部二院清理元代小型砖室墓一座，其中出土了一件元代景德镇窑青白瓷梅瓶和一组黑陶明器，包括罐、盆、碗、釜、

尊等⁹¹。

作为重要墓葬遗迹的还有耶律楚材的墓和祠，其位于颐和园昆明湖东岸，文昌阁以北，为墓、祠合一的两进双层套院。第一进院落正房为祠堂，面阔三间，内供奉耶律楚材泥塑像。院内有高达3米的石碑一座，碑阳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御制《耶律楚材墓碑记》，碑阴为大学士汪由敦撰《元臣耶律楚材墓碑记》，旁立石翁仲一。第二进院落北房三间，内有耶律楚材及续弦夫人苏氏合葬的丘冢。耶律楚材墓始建于元代，按生前要求葬于瓮山泊（昆明湖）畔，时建庙立像，极为隆重，并成为大都西郊名迹，供人凭吊题咏。明初墓地遭到彻底破坏，清乾隆年间修造清漪园时，于原地恢复了祠墓，并立碑记其始末，昭其功德。1860年，祠、墓均为英法联军焚毁。现存地面建筑系光绪时（1875-1908年）重修，祠堂、墓丘一如旧制⁹²。

此外，1983年在羊坊店街道公主坟南发现三座元代窑址，窑壁高约1米，壁厚0.3米。出土物除少量黑釉瓷片外，主要是各色琉璃建筑构件和窑具，其中有白琉璃砖、绿琉璃砖、素面砖、沟纹砖、筒瓦、板瓦、绿琉璃宝顶等物，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窑具。根据窑址的地理位置、出土器物及文献记载等情况，推测是元代至元四年所建的西窑厂⁹³。

从总体来看，北京地区元代的考古工作实际以元大都的勘察与发掘为核心，在海淀区范围内也发现有不少非常重要的城市考古遗迹。另外，在元大都的考古过程中，还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遗物和文字材料，进一步推动了元大都的研究。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至2009年约有50座左右，相对于辽金墓葬来说，数量较少，不过分布范围较广。海淀区内的元代墓葬数量很少，不过出土了耶律铸夫妇墓这种等级较高的墓葬，并发现了墓志，这为我们了解元代的政治、宗教、思想、民族融合等信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另外在羊坊店街道发现的琉璃窑址，为此前所少见，为我们研究元代宫廷的琉璃烧造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

88 李华：《元大都北土城花园路段城墙勘探及水关遗址清理简报》，《北京考古》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89 程利：《耶律铸夫妇合葬墓简况》，《北京文博》，1998年第4期，彩三-彩四；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元耶律铸夫妇合葬墓》，《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111-115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90 国家文物局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第215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91 李昂主编：《沉香越千年——海淀历史文物展》，45-47页，海淀博物馆，2012年。

92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北京元代史迹图志》，283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

93 赵光林：《近年北京地区发现的几处古代琉璃窑址》，《考古》，1986年第7期，第628-631页。

六、郊居选胜——明清时期海淀的文化遗存⁹⁴

1. 明代的海淀。明军攻占元大都城，旋即将城市向南收缩了5里，构成了以后的明清北京城的内城，今海淀区原纳入元大都城的部分也基本被废弃了，海淀区辖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郊区。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城市格局一仍其旧，海淀地区辖地分属宛平、昌平两县（州）。明代海淀区辖地成为重要的墓葬区，不仅有位于董四墓山脚下的妃嫔墓群，还有紧傍卧佛寺的四王子村一带的王子公主墓区，特别是在青龙桥镇金山口，安葬了葬于明十三陵以外的三个帝王之一的景泰帝，这座由原郕王墓扩修而成的皇陵，埋葬着在宫廷斗争中落败而死的景泰帝，不论当时英宗使用了多少伎俩，景泰帝最终下葬于此，还是由于这里已经有了相应的机构，被认为是风水合宜，景色佳好之地。仔细查看，这里的风水、景色与十三陵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如此，王公贵胄均趋之若鹜，选择这里作为茔地，明朝曾有“一溜边山府，七十二座坟”的佳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的政治配置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太监群体，看中了这里风水和景色的佳绝，以及寺庙林立、佛境幽深的特点，也大批埋葬于这里⁹⁵。

海淀区明代墓葬发掘较多，高等级墓葬主要有妃嫔墓、皇子墓、公主墓、外戚墓及太监墓，另有较多的平民墓葬。其中的高等级墓的一般特征是：三合土技术广泛使用，还有少量石室（石椁）墓，并有精美的石刻装饰⁹⁶；墓葬封护严密；墓志均是带字面扣合，外加铁箍两道；墓中随葬前朝旧钱或形态丰富的厌胜钱等。

就墓葬形制而言，有竖穴土坑墓、砖室墓、罐装骨灰的火葬、三合土浇筑墓、八角（或六角）砖穴墓和石室墓等多种形制，其中以竖穴土坑墓为主。竖穴土坑墓中一般都有木质葬具，有棺无槨。根据埋葬人数，又有单棺葬、双棺葬、和多棺葬，前两种较多，多棺葬少见⁹⁷。砖室墓虽然大小不一，形制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大多是用砖砌出墓框，用石条或石板盖顶，墓内有石棺床，上置葬具。这类墓大多等级较高，出土物丰富，首都博物馆和海淀区博物馆所藏的大批明代精美文物都是这类墓

葬中出土的。

明陵不似宋陵，陵区里不设皇室宗亲的陪陵墓，明朝皇帝之子多被封为藩王，藩王分据各地，各自在当地安葬。皇后又与皇帝同陵合葬，所以在陵区或在北京，独立存在的只有妃嫔墓葬，明代妃嫔葬制分从葬和从葬两种。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载：“自英宗既止官人从葬，于是妃墓始名，或在陵山之内，或在他山。”⁹⁸妃嫔葬所在北京有两处，一处是在十三陵内的东西二井，另一处在海淀区金山，即今海淀区青龙桥西北，明朝时称为金山。葬在金山的还有诸王、公主。《长安客话》载：“凡诸王、公主夭殇者，并葬金山口，其地与景皇陵相属，又诸妃亦多葬此。”⁹⁹是北京地区十三陵以外另一处妃嫔墓的主要分布区，且数量多于十三陵区的妃嫔墓¹⁰⁰，据文献记载到清顺治十一年有53处。后以墓名村，有东四墓、西四墓等村。

海淀区发掘过的妃嫔墓较为重要的有董四墓村天启、万历帝妃墓。1951年8月至11月，在金山董四墓村清理了两座明代妃嫔墓，共葬十个妃嫔。一号墓埋葬天启帝的三个妃子，墓有宝顶、墓门、前室、主室组成。宝顶呈截尖圆锥形，平顶，高约4米。用土掺石灰夯成，位于主室之后，并不直接压于地下墓室建筑之上。地下墓室是一座平面呈“工”字形的宫殿式建筑，分为前室和主室两部分，“工”字形殿是明代的制度，在墓室中也反映出来。各室用石门相连，且都有实际用作墓顶的仿木结构建筑。主室为四阿式顶，正脊长13.8米，高7.2米，并使用实际的琉璃构件。主室靠后墓壁用石条筑成石棺床，放置3口棺椁。在每个椁底靠后墙处棺尾附近，各置1合墓志，铭文合在中间，外面绕有两条铁箍，再外覆木匣。从墓志位置，可知左侧是天启帝的张裕妃、中间是段纯妃、右侧是李成妃。墓室被盗，出土遗物不多，有“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青白瓷梅瓶3件，有凤冠上的装饰品及金簪等。玉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镶嵌在凤冠上的饰物，另外一类是玉扣，浮雕植物花纹。出土珍珠大小不等，可能是凤冠上的装饰品，也有的是镶嵌在金饰上面的，共千余粒。另外还有钱币、梳和篦等¹⁰¹。

二号墓埋葬万历帝的七个内嫔，位于一号墓东北约300米处。形制由宝顶、墓门、前室、后室组成。平面呈“工”字形。

94 此句出自（明）王嘉谟：《丹棱洪记》，内录元上都路制使朵里真文，云：“负山丛丛，盖神皋之佳丽，郊居之选胜也。”载（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五，第1265-126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95 刘耀辉：《明代太监的丧葬》，《北京文博》2001年第3期，第25—39页。

96 海淀区文管所曾清理40余座明太监或贵族墓，有不少是由石板制作的石椁，部分还有精美的石刻。这批石刻原藏于海淀区文管所，现下落不明。

97 宋大川主编：《北京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下，39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98 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1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99 （明）蒋一葵：《长安客话》，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00 李永强著：《北京考古史（明代卷）》，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01 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2期，78-87页。